

陕西靖边清平堡遗址

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是明代延绥镇长城沿线驻军城镇“三十六营堡”之一，属于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是一个立体的、纵深的、庞大的军事建筑体系，也是一组庞大的文物遗存体系。明代长城分为九边管轄，延绥镇即是九边之一。明代延绥镇长城由大边、二边、营堡等三部分组成，具体的遗迹包括墙体、单体建筑、关堡、营堡、相关遗存等。

清平堡是延绥镇下辖中路西端的一座营堡，北邻中路榆林分守道下辖的威武堡，相距20千米，西邻延绥镇西路靖边分守道下辖的龙州堡，相距15千米。清平堡西距明延绥镇长城大边约10千米，西距明延绥镇长城二边约3千米。清平堡周边为沙漠地貌，北、东、南三面环河沟，东侧河沟对岸为黄土地貌。

清平堡现存堡墙一周，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600米，堡内高低起伏，为流沙覆盖。在堡外西侧，有三处护城墩，堡外南侧有两处砖拱桥。

据清修《延绥镇志》记载，清平堡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建置。“周三里八十步，南、北门二，楼铺十座，系极冲中地。隆庆六年(1572)加高，万历六年(1578)增修，砖砌。”

清平堡考古工作

2020年至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清平堡开展考古工作。对周边进行了调查，对营堡内部进行了全面勘探，并进行了重点发掘，共发掘5930平方米。探明清平堡及周边不同功能区的分布，清理揭露了一批建筑遗迹，并出土一批彩绘泥塑和其他遗物，但军事类遗物极少。

功能区

通过调查勘探，清平堡遗址划分若干功能区：营堡居住区，在营堡城墙范围内，主要是营堡驻军及家属的驻守生活区域；护城墩，在营堡外侧附近，共三处，是为营堡本身的安全提供警戒瞭望的设施；砖窑区，在营堡北侧河沟北岸，是为营堡修建提供砖瓦建材的陶窑分布区域；墓葬区，在营堡外西北高地，是营堡内居民墓地分布区域；屯田，在营堡外东侧河沟东岸，是营堡驻军屯田的区域，通过两座砖拱桥与营堡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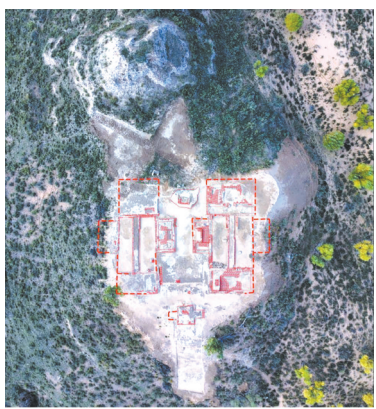
遗迹

发掘清理的建筑遗迹，用材为夯土、砖、石等，根据建筑用砖、结合文献记载，可将清平堡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成化至万历年间，晚期为万历至康熙年间。

中心楼(二号建筑) 二号建筑位于清平堡内南部平坦区域的中心位置偏东，现存为夯土包砖高台，顶部残破，台体下设四出券洞，连接堡内四条主干街道。台体南北长17米，东西长12米，残高4.2米。根据建筑形制和用砖规格，该建筑整体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建筑平面为正方形，边长12米，下设十字券洞。晚期建筑部分是在早期建筑的南侧增建，增建部分南北长5米，东西宽12米。晚期部分下设南北券洞与早期券洞相通，该券洞顶部低于早期部分券洞顶部0.6米。



明朝风格彩绘泥塑



堡外佛寺



中心楼遗迹全貌



显应宫平面布局

根据建筑形制，二号建筑位于清平堡的规划中心位置，名称为中心楼，这类建筑在明代延绥镇三十六营堡中都有，也是明代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平门(五号建筑) 五号建筑位于清平堡南城墙中部，是南城墙上的一处门址，门外有瓮城。在南城墙只发现这一处门址，文献中记载该门名称为“清平门”。清平门开在城墙上，与中心楼南侧券洞正对，砖砌券洞式单门道形制。门道东西宽3.5米，南北长8.4米。门道铺砖，大部为流水冲毁，门道两侧残存有红色条状砂岩砌筑的基础。门外设瓮城，瓮城内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3.4米，南北宽9.5米。瓮城门开在瓮城东墙中部，门道南北宽3.3米，东西长4.6米。瓮城门为砖砌券洞式单门道，门道内堆积大量砖，排列整齐，保留了券洞的排列方式。瓮城北、西两面为营堡的城墙，宽8.4米，东、南两面为瓮城城墙，宽4.6米，残高1-6米。内部为夯土夯筑而成，夯层明显，外部为双层青砖包筑，墙体顶部残留三合土防水层，外侧墙基部分为两层红砂岩条砌筑。根据建筑材料和文献记载，清平门有两期，早期为夯土城墙、砖砌城门，时代为成化十一年至万历六年；晚期为砖包城墙，时代为万历六年至康熙年间。

显应宫(一号建筑群) 一号建筑群位于中心楼西侧偏北，平面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65米，东西长约25米，建筑上部被破坏，下部残存高度1-2.5米，建筑均为砖砌。根据建筑内出土的碑记，这是一处名为显应宫的城隍庙遗迹。显应宫由砖砌的照壁、旗杆、大门、院墙、戏台、东西两庑、祭坛、正殿、寝宫等部分组成，整体呈轴对称分布。根据建筑用砖的规格，显应宫建筑可分为早晚两期。大殿下部、戏台下部、大门下部为早期建筑，用砖较大，尺寸为44×22×8厘米。东西两庑、寝宫、照壁为晚期建筑，大殿、戏台均于晚期经过二次修缮，用砖较小，32×16×6厘米。参考碑记内容，早期时代为成化至万历二十六年间，晚期时代为万历二十六年至康熙年间。在东西两庑出土的泥塑神像可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明朝风格的形象和蒙古风格的形象，尤其体现在这两类塑像眼珠颜色和材质的区别上。明朝风格服饰塑像的眼珠黑色，玻璃材质，蒙古风格服饰塑像的眼珠棕色，漆料瓷质。

南大街(L1)、西大街(L2)、东大街(L3) L1、L2、L3位于营堡内，L1位于南侧，连接中心楼与清平门。

L2连接中心楼与西城城墙台。L3连接中心楼与营堡东门。宽度均为12米，沙土堆积层厚度1.5-2米，包含大量炭屑、碎骨等，界线不清晰，没有典型路土层，平面无法清理展现。根据位置，判断这是营堡内主干大街，应该在中心楼北侧还有北大街存在，共同构成营堡基本的框架干线。

堡外佛寺(六号建筑群) 六号建筑群位于营堡西外侧200米处护城墩南侧的台地上，破坏较严重，残存遗迹高度0.3米，但平面布局比较清晰，为一处南北向方形院落，长23.5米，残宽25米。内部可分为两组院落，分别由正殿、两庑、倒座组成，两组共用的大门位于南侧，门外向坡下有步道。根据正殿和两庑出土泥塑神像脚部迹象和经幢残块及基座判断，这是一处佛教寺院遗迹。根据残留建筑用砖判断，为早期建筑。

墓葬 墓葬区位于营堡外西北侧高地，距离营堡北门外约500米。共清理2座墓葬(编号M2、M3)，均为小型土洞室墓，不见棺，随葬品1-2件，M3出土“万历通宝”1枚，时代为明代后期。经过对入骨进行鉴定，二人来自不同人群，M2墓主可能与南边的闽台人群有关，受西北地区的人群影响。而M3个体很有可能是晋陕地区受欧罗巴成分影响的混血后代。

清平堡考古工作收获

通过清平堡遗址的考古工作，我们发现了真实的长城：出于军事目的修建的清平堡，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主要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在清平堡使用的时空范围内，蒙汉两族之间的关系是以和平、友好的交流、融合为主，清平堡促进了民族的交流融合，为民族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场地。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是长城两侧的民族与文化发生交流、融合的场所。

通过清平堡遗址的考古工作，明确了长城在使用过程中促进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具体作用，增强了长城南北两侧人群对长城遗址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通过持续深入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明确长城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靖边县文物保护中心 执笔：于春雷 田厚鑫 张亚旭 李坤 康宁武 高展)

山东威海甲午沉舰遗址

我国境内的北洋海军甲午沉舰遗址分布在黄海北部及威海湾两地，源于1894-1895年间中日黄海海战与威海保卫战两次战争。2014-2016年，随着致远舰遗址水下考古工作在辽宁丹东黄海北部持续开展，由此拉开甲午沉舰系列水下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并于2017年确定为我国北方海域水下考古重点工作。2017-2023年，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省甲午战争博物院、威海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在山东威海湾进行甲午沉舰水下考古调查，5年考古工作陆续发现定远、靖远、来远三舰，取得了重要考古收获。

考古清理之前运用多波束、浅地层、磁力仪等多种物探技术对遗址全区进行勘测，核实遗址的埋藏位置、钢铁残量及海泥堆积厚度。勘测表明磁点源呈散点分布，磁力信号微弱，残存钢铁量不大；浅地层剖面仪亦未发现舰体轮廓，沉舰残损与考古结果吻合。之后进行人工钻探，按间隔10米布设基线，钻深3米、孔距2米，由此界定遗址分布范围及主体区位置。布方发掘选择在钻探确认的遗址主体区，探沟大小一般为100(5×20)平方米，每个沉舰遗址基本上按舰的船、舢、艀三处布设探沟，考古清理采用负压式气抽方式，抽沙管由水下队员及广州打捞局在海底分组操控，抽泥深度最深达3.5米，平均抽深2米。

遗迹与遗物

威海湾内的甲午沉舰遗址已被泥沙完全掩埋，湾内海床平坦，水深6-8米。泥层堆积基本上呈平面分布，泥沙来自海湾泥沙沉降。表面0.5-1米厚度为松软淤泥，黄褐色，易被抽走，泥层中偶见贝壳及渔网、瓶子、塑料袋等现代垃圾；其下即为粘性较强的胶泥，灰褐色，较难抽出，需借助高压水枪冲刷后再予抽出。此层泥中含有大量煤块、沉舰残物及凝结物，为沉舰堆积层。沉舰区域之外则为较纯净的胶泥，临近岸边的来远舰海床表面还悬浮有薄薄一层浮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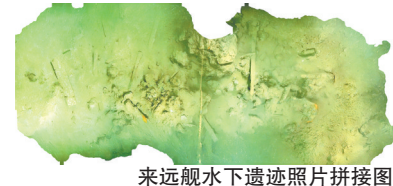
各沉舰遗址分布面积850-2100平方米不等，埋于海泥下0.5-3米深。物探获知的残存钢铁体量不大，磁力数值仅300-1200nT。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对各沉舰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打捞与拆解，以致海底已没有舰体，仅存的遗迹、遗物呈散落分布状态：凝结块不规则散落，木板残断零乱，钢板残碎扭曲。按照遗物种类大致能判断原舰体的船、舢及艀部等位置；艀部区多发现大量小口径子弹及大量铁质凝结块；舢部区多发现与锅炉及动力舱相关的煤炭、耐火砖、工具等遗物；艀部区多发现个人生活物品及舱室墙壁木板。来远舰由于倒扣，还发现多条折断的钢缆，推测为桅杆处的绳缆。

定远舰，1883年德国伏尔铿船厂建造的铁甲舰，1895年2月9日自毁沉于刘公岛东南部。遗址发现于刘公岛东村外500米处，艀部区域以大量小口径弹药及铁质凝结块为主，艀部区域以舱室木板内饰及生活物品为主，所处位置及遗物种类与定远舰的舱室布局基本吻合。较重要的遗迹现象包括艀部主炮区发现一块巨大的防护铁甲，周边还发现弧形的炮台甲板木板、“第44-48横肋间双底内量水管”标牌，均指证为主炮台位置。2018-2020年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结束时对铁甲板进行了成功提取，成为现存唯一一定远铁甲。

靖远舰，1887年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穹甲巡洋舰，1895年2月9日被日军威海南帮炮台击伤进水，为免致沉，由北洋海军发射鱼雷击沉。2022年水下考古调查确认遗址位于威海湾中间，东北方距刘公岛铁码头1千米远。在三艘沉舰中以靖远舰保存最妥，海底遗物沿两侧舷边分布，有钢板、木板及大量凝结物，走向与沉舰大体一致，木板多断裂、钢板多有扭曲与移位，与战后日本拆解密切相关。遗址中部(原舱室中)反而很少有遗物。较重要的发现是在两舷侧发现2箱37毫米哈乞开司炮弹箱、艀部发现1枚210毫米主炮炮弹箱。

来远舰，1887年德国伏尔铿船厂建造的装甲巡洋舰，1895年2月6日被日军鱼雷击沉沉扣于海底。遗址正对北洋海军公署，距刘公岛旅游码头外500米远。经2023年水下考古调查，遗址中心区发现一堆由各种舰材、个人物品、弹药等形成的凝结块堆，有钢板、木板及舱室壁板、家具板材等，看不出舰体形态与走向，应为战后拆解的废弃堆。来远舰一侧还发现多条已折断的钢缆，为沉舰翻扣时拆断的桅杆绳缆。

威海沉舰遗址及地层中的遗物集中反映清末北洋海军舰载物品的时代特征。各舰出水遗物大体类似，



来远舰水下遗迹照片拼接图



定远铁甲近照



出水文物登记



墨书“来远”的木质水手身份牌



小口径子弹合照

夹杂在凝结块、煤渣、碎木板之中，有骨、陶瓷、铜、铁、木、皮革等不同材质，共提取文物总计4000余件，包括大量的同类子弹。常见遗物种类包括船木板、船肋钢板、舷窗盖、耐火砖、管件等造船构件；碗、盘、勺子、皮鞋、纽扣、铜锁、水烟袋、麻将牌等个人生活类物品；引信、发火管、手枪弹、步枪弹、哈乞开司炮弹、军刀等武器弹药。沉舰遗址中发现的定远铁甲、37毫米哈乞开司木质弹药箱、120毫米炮弹、210毫米主炮弹、军刀均为首次发现。其中，定远铁甲边宽260、高283.2、厚30.5厘米，重达18.7吨，为产自英国的康邦复合装甲，内为软铁，外敷硬钢，对于确认定远铁甲舰身份以及研究一级铁甲舰的防护能力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靖远舰发现的37毫米哈乞开司弹药箱，外形为木箱，内装60枚完好的穿甲钢弹；来远舰发现的120毫米炮弹印证了甲午海战之前临时加装艀部火力的传言，还发现1把军刀，长73厘米，钢铁材质，腕式护手，大体完好，为英国样式的海军官佩剑。来远舰出水1块木质的登舰舷梯，木质有高温烫痕痕迹，证明黄海海战中弹起火，还来不及完全修复的记载。诸多沉舰文物为还原黄海海战细节、研究北洋海军制式装备提供宝贵资料。遗址中明确军舰身份的遗物共发现3件：1把篆刻有“来远”二字的镀银汤勺、2块用墨书写就的水手身份木牌：“来远三等水手张元”和“来远一等水手张长发”。木牌背印“行”字，在大连经远舰、武汉中山舰中均有类似发现，为舰上人员的身份牌。经查，于盛元为山东荣成人，在威海保卫战中胳膊受伤，战后得到40两银子的补偿，由此留下抚恤记录。

认识与意义

考古调查期间，采集与分析威海湾内、外的沉积环境数据，结合日本战后打捞档案，可还原出沉舰遗址形成过程：战败受损进水，下沉触底并微陷入海底软泥中，战后日本民间打捞公司在三年时间内很快将舰体拆解殆尽，其后130年来，随着夏季暴雨大量泥沙注入湾内，加之相对封闭的海湾环境，泥沙沉降最终将沉舰残骸完全埋于海床之下。

截至2023年，水下考古调查已掌握威海湾内北洋海军甲午沉舰的准确位置与保存现状，填补了我国近现代钢铁沉舰遗址水下考古空白，探索出一套实践可行的近现代沉舰考古与保护工作方法，总结出磁力物探技术在沉舰水下考古中的优势应用经验。依据沉舰水下考古调查成果设立了首个山东省级威海定远舰遗址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沉舰考古成果对于推进甲午战争研究、清末海防、沉舰遗址原址保护以及博物馆专题展在弘扬爱国主义公众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执笔：周春水 王泽冰 孟杰 薛广平)

北京海淀四王府村明代皇室墓地



MY1M3墓室后壁、墓志及石几



MY1M2三维结构



MY2M4金刚墙及墓志



MY3M1三维结构

墓地于北京市海淀区四王府村，南邻国家植物园，北为四王府小学、回民村，东为四王府自然村。墓地北、西、东三面为寿安山环抱，南有水自西北向东南穿流而过。墓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方普觉寺建设控制地带和金山地下文物埋藏区。2022年11月至2023年9月，为了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海淀区四王府村明代皇室墓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9200平方米。

主要发现

此次发掘，共发现明代皇家墓园3座，自东向西依次编号为MY1、MY2、MY3。3座墓园东西并排分布，均坐北朝南，前方后圆，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

墓园1(MY1) 保存基本完好，南北长120.7米，东西宽63米。墙垣全部用虎皮石砌筑而成，东、西、北三面围墙均有保存，南围墙仅保存虎皮石基础及散水。南围墙正中为墓园大门，面阔9米。墓园中部有二道墙及二道门，将整个墓园分隔成前后两进院落。前后进院落内有享堂及附属建筑。享堂面阔三间，长约15米，宽约10米，格局基本完整。附属建筑位于享堂东南部，紧邻东围墙，与东围墙共用散水。后进院落内有石砌祭台1处、墓葬2座。墓葬分别编号为M2、M3。均为长斜坡墓道纵长方形单室墓。墓室内均用夯土回填。M2内券顶，外加盖仿庑式顶。券顶为三券三伏。外屋顶表面用方砖铺砌，外观呈两面坡式硬山顶。M3仅为券顶，二券二伏。两墓墓道尽头，墓室南壁外侧均有金刚墙。墓室砖壁及券顶均采用磨砖对缝工艺砌筑。墓室南壁正中均有门道及石门。墓室内前部均有石五供座、石缸座、石神座；后部有石棺床和石几。棺床尾部、紧贴墓室后壁位置均有墓志，其中M2墓志遗失，M3墓志保存完好。M2墓室底部铺砖，M3墓室底部铺红色不规则石块、石片。出土有琉璃五供、大缸、玉璧、木俑等随葬品。

墓园2(MY2) 保存稍差。东西宽56米，南北清理长度104米。墙垣只剩下夯土基础。根据夯土基础，可清楚判断出墓园大门和疑似二道墙位置。墓园门址仅存夯土基础，面阔10米。二道墙仅在位于西围墙和

墓道处发现对应的夯土。前进院落内有3处附属建筑，其中1处编号为F2的建筑保存较好。后进院落内有墓葬1座，编号为M4。M4为长斜坡墓道前后双室墓，保存基本完好，由墓道、金刚墙、前室、石门、后室组成。墓室内券顶外屋顶。墓道内用夯土回填。金刚墙正中为人字形彩门。前后墓室砖壁及券顶采用磨砖对缝工艺砌筑。前室呈纵长方形，内有石质神座、五供座、缸座。后室呈纵长方形，内有石砌须弥床和石几。墓室底部全部用方砖铺砌。出土有琉璃五供、大瓷缸、青白釉梅瓶、玉璧、红蓝宝石、金饰等。此外，在墓道尽头、紧贴金刚墙外有墓志1合。

墓园3(MY3) 由于受到晚期破坏及发掘区域所限，仅揭露出部分东围墙和二道墙。墓园揭露部分东西宽54.8米，南北长30米。东围墙用石块垒砌，局部尚保存有完好的石铺散水和墙外护坡。二道墙东部与东围墙相接，亦用石块垒砌。二道墙内即第二进院落内有祭台1处、墓葬1座。墓葬编号为M1。为长斜坡墓道大型砖室墓，仅清理出墓道和大型横前室。墓道内用夯土回填。墓室东西内长18.9米，南北内宽4.5米。墓顶为券顶，三券三伏。墓室砖壁及券顶用小砖砌筑，用砖及砌筑工艺均不及M2、M3、M4。墓室东部、西部均有器物台，推测用来放置仪仗。墓室后壁正中有石门两扇，石门左右紧邻前室后壁均有石神座1具。除石神座外，墓室内散落有被扰动过的石供座、石几、石缸座、石扶手、石靠背等。该墓扰乱严重，出土器物较少。仅在夯土中采集有个别琉璃构件、砖瓦残件及碎瓷片等。

此外，在墓园1、墓园2的东南部均发现水井1口。

认识、价值及意义

认识

墓园主人 墓园1：根据出土墓志，墓园1内M3墓主人为万历皇帝四女云梦公主，母王恭妃，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4岁。M2位于M3东侧，位于墓园1的主位，加盖外屋顶，据此M3墓主人身份较云梦公主为尊。通过梳理万历皇帝早殇诸子，且与云梦卒年相差无几者，初步判断M2墓主人为邠哀王(母皇贵妃郑氏)。故墓园1为早殇皇子、公主合葬园寝。墓园2：根据出土墓志，M4的墓主人为嘉靖皇帝裕嫔王氏

园寝，卒于嘉靖十九年(1591)，年29岁。墓园2为裕嫔园寝。墓园3：未出土明确纪年遗物，根据其纯券顶结构，内部有两座神座，推测其为明代妃嫔合葬墓，且至少埋葬二人。墓园3为一座妃嫔合葬园寝。

墓园布局及营造次序 3座园寝均为前、后两进院落，中部由二道墙分割。整个墓园由大门、围墙、二道墙、享堂、祭台、附属建筑、墓葬组成。墓门、享堂、二道门及主墓位于墓园的中轴线上，营造次序为先建墓葬，再建墓园建筑及围墙。

墓葬形制 根据墓室数量多少，可分单室墓和双室墓。早殇未成年皇子、皇女以成人礼下葬，用单室墓。妃嫔用前、后双室墓。根据墓室结构，可分类屋式墓和砖券墓。M2墓室券顶外加盖屋顶，M3(公主)墓室券顶外加盖屋顶，M4亦为仿屋顶，可知屋式墓较砖券墓较尊。但不管墓葬形制有何不同，其墓室内均有五供、缸、宝座、玉璧等，可见这些随葬品为标配。

价值及意义

墓葬结构及墓室内各要素的配置情况明确，如墓顶及墓室结构、砌法、工艺等。墓葬内五供、石几、神座、墓志、棺床等位置明确，为复原墓葬结构及内部形态提供了实证。

三座墓园布局基本清晰，形制完整，墓葬及享堂结构基本完好，为研究明代陵墓制度、建造工艺、官式建筑等提供了科学资料。同时，墓地建筑营造代表着当时最高工艺水平，对明代建筑考古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实物标本。

建筑用砖上多有戳印，如“嘉靖十八年春季窗户孙文铭造”“嘉靖拾捌年秋秋季窗户□□□”“甲申年临清”“分窗户”“作头”等等，为研究皇家用砖的形制、生产、储备、使用及背后的窑业制度提供了重要信息。

出土墓志、琉璃五供、梅瓶、瓷缸、木俑等为研究明代皇室成员的丧葬礼制、御祭用器等均具有重大价值。其中2座墓园的部分原始地坪尚存，为后续整个墓地的复原研究提供了标高。

总之，此次考古发掘，是北京地区首次较为系统、完整地明代皇室墓园进行的科学揭露。三座墓园级别仅次于明代帝陵，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科学及艺术价值。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执笔：张利芳 张中华 范泽华)